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 清修 主编

明朝佛教史论稿

何孝荣 著



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清修
副主编 圣凯道坚 戒清 黃夏年



明朝佛教史论稿

何孝荣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佛教史论稿 / 何孝荣著. - 北京 : 宗教文化出版社, 2016.11

(宝庆讲寺丛书·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、清修主编)

ISBN 978-7-5188-0306-4

I. ①明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佛教史-中国-明代

IV. ①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0138 号

明朝佛教史论稿

何孝荣 著

出版发行：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：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363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：黄夏年

责任编辑：杨登保

版式设计：贺 兵

印 刷：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

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版本记录：889×1194 毫米 32 开本 17.5 印张 500 千字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88-0306-4

定 价：58.00 元

总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，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，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，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，往往有所偏向，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，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作为佛弟子来说，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，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，如“阿毗达摩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，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，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，重修证的佛教，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，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，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，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，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到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，但都是佛法的根本，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，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，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，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；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

著,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,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,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;净土法门的流行,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,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,我们也应该看到,随着禅、净的流行,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,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,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,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,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,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,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,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,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,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、纯学术性,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,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,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,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,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,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,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《楞严经》的辨伪,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,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,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,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,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,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、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”。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中去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

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的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;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,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,勤于读书,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,参访名山大寺,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,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,我都会带上一些书,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,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,蔚为大观,感到欣慰。但是,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,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,而且现有书籍之中,难免良莠不齐,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有感于此,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,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,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,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,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,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Contents

目录

001 / 总序 朗字

一、明朝宗教特点与佛教政策

002 / 论明朝宗教的特点

019 / 明代佛教政策述论

054 / 论明代的度僧

075 /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

097 / 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

131 / 明初善世院考

二、明朝皇帝与佛教个案

144 / 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

164 / 俗界对佛寺生态环境的保护

——以明太祖对灵谷寺生态环境的保护为例

177 / 论明成祖与佛教

200 / 论明宣宗崇奉密教

221 / 论明宪宗度僧

- 241 / 论明宪宗崇奉藏传佛教
280 / 论明武宗崇奉藏传佛教
296 / 明武宗自号大宝法王、大庆法王及大护国保安寺考析
317 / 论明世宗禁佛

三、明朝宦官、官员与佛教

- 336 / 明代宦官与佛教
361 / 论万历年间葛寅亮的南京佛教改革
395 / 明人汪可受与佛教

四、明朝名僧

- 414 /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
429 / 印僧撒哈咱失里与元明时期印度密教在中国的传播
453 / 元末明初名僧来复事迹考
473 / 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
493 / 明朝华严名僧素庵真节与栖霞寺佛教
516 / 从高僧到大师：论憨山德清的崂山生涯

545 / 《宝庆讲寺丛书——中国佛教学者文集》
已出书目

一、明朝宗教特点与佛教政策

明朝宗教的特点，是其宗教政策的显著特征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持反感情绪，他本人对佛教僧徒也极不信任，对僧徒的剥削和压迫，对寺院的掠夺，对僧徒的残酷镇压，都是十分严重的。但同时，他又对道教持宽容态度，对道士也十分优待，对道教的扶持，对道士的奖赏，对道观的修建，对道教的重视，都是十分明显的。这在明朝宗教政策上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

明朝对佛教的政策，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：

- 1. 对佛教僧徒的剥削和压迫：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僧徒的剥削和压迫，是十分严重的。他本人对佛教僧徒也极不信任，对僧徒的剥削和压迫，对寺院的掠夺，对僧徒的残酷镇压，都是十分严重的。这在明朝宗教政策上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
- 2. 对道教的扶持：明朝对道教的扶持，是十分明显的。明太祖朱元璋对道教的扶持，对道士的奖赏，对道观的修建，对道教的重视，都是十分明显的。这在明朝宗教政策上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
- 3. 对佛教寺院的掠夺：明朝对佛教寺院的掠夺，是十分严重的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寺院的掠夺，对僧徒的剥削和压迫，对寺院的掠夺，对僧徒的残酷镇压，都是十分严重的。这在明朝宗教政策上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
- 4. 对佛教僧徒的残酷镇压：明朝对佛教僧徒的残酷镇压，是十分严重的。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僧徒的残酷镇压，对僧徒的剥削和压迫，对寺院的掠夺，对僧徒的残酷镇压，都是十分严重的。这在明朝宗教政策上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

论明朝宗教的特点

明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,传统的封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,社会各领域呈现出种种新因素,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,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发展阶段。明朝的宗教,包括传统的佛教、道教以及新传来的伊斯兰教、天主教及新兴的罗教等民间秘密宗教,其传播流衍呈现出诸多特点。探讨明朝宗教的特点,有助于更好地解析明朝宗教及社会。

一、明朝历史概貌

1.明朝帝系

明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。这一时期,一方面是传统的封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,另一方面是社会各领域呈现出种种新因素,酝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,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

会进入晚期发展阶段。

自 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，正式建立明王朝，至 1644 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，明思宗自杀，明朝灭亡，明朝在历史上共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，其国祚绵长仅次于唐朝。其间，先后有太祖朱元璋、惠帝朱允炆、成祖朱棣、仁宗朱高炽、宣宗朱瞻基、英宗朱祁镇、代宗朱祁钰、宪宗朱见深、孝宗朱祐樘、武宗朱厚照、世宗朱厚熜、穆宗朱载垕、神宗朱翊钧、光宗朱常洛、熹宗朱由校、思宗朱由检十六位皇帝，在九五至尊的皇帝大位上统治中国（其中英宗朱祁镇两度登上皇位）。明朝皇帝世系，我们制成下表：

明帝世系表

庙号	帝名	属系排行	年号	时间	庙谥	陵名
太祖	朱元璋	开国皇帝	洪武	1368—1398	高	孝陵（南京）
	朱允炆	太祖孙	建文	1399—1402	惠	不知所终
成祖 (太宗)	朱棣	太祖第四子	永乐	1403—1424	文	长陵
仁宗	朱高炽	成祖长子	洪熙	1425	昭	献陵
宣宗	朱瞻基	仁宗长子	宣德	1426—1435	章	景陵
英宗	朱祁镇	宣宗长子	正统	1436—1449		
代宗	朱祁钰	宣宗次子	景泰	1450—1456	景	以亲王礼葬
英宗	朱祁镇	宣宗长子	天顺	1457—1464	睿	裕陵
宪宗	朱见深	英宗长子	成化	1465—1487	纯	茂陵
孝宗	朱祐樘	宪宗第三子	弘治	1488—1505	敬	泰陵
武宗	朱厚照	孝宗长子	正德	1506—1521	毅	康陵
世宗	朱厚熜	宪宗孙	嘉靖	1522—1566	肃	永陵
穆宗	朱载垕	世宗第三子	隆庆	1567—1572	庄	昭陵

庙号	帝名	属系排行	年号	时间	庙谥	陵名
神宗	朱翊钧	穆宗第三子	万历	1573—1620	显	定陵
光宗	朱常洛	神宗长子	泰昌	1620	贞	庆陵
熹宗	朱由校	光宗长子	天启	1621—1627	憲	德陵
思宗(毅宗、怀宗)	朱由检	光宗第五子	崇祯	1628—1644	愍	思陵

2. 明史分期

自上世纪初以来,明朝历史就引来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索,对明史分期也提出多种主张,见仁见智。我们根据明朝的政治、经济发展历程,结合明朝皇帝对宗教的态度,兼顾各个朝代的完整性,将明朝分为初期、中期、后期三个阶段。

(1) 明朝初期,从洪武元年(1368)至宣德十年(1435),这是明朝建立、发展时期。

太祖建国后,对元末政治拨乱反正,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,创建了中央以五府六部为主体,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,强化了以皇权为主导的中央集权制度,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,轻徭薄赋,休养生息,使社会秩序逐步稳定,经济恢复和发展,开有明一代帝业。惠帝继位后,复古改制,实行宽仁之政。但削藩措施不当,引起靖难之役,惠帝终被推翻。成祖夺得帝位后,继续削藩,设置内阁,数征北元残余势力,派宦官郑和等出使西洋,恢复发展生产,开通漕运,编纂《永乐大典》,迁都北京,明朝逐步走向强盛。仁宗、宣宗统治期间,奉行守成政策,确立内阁制度,继续劝垦蠲免,整顿财政和吏治,缓和社会矛盾。自明朝建立,“至是历年六十,民气渐舒,蒸然有治平之象”^①,形成所谓“仁宣之治”。

^① 《明史》卷9《宣宗本纪赞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
(2) 明朝中期,从正统元年(1436)至嘉靖四十五年(1566),是明朝衰弱、祸乱时期。

正统初期,“三杨”等辅政,继承洪熙、宣德年间的各项政策。正统七年(1442)以后,宦官王振专制朝政,擅起边衅,终而酿成“土木之变”,英宗被俘,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。景泰年间,加强北京防御,打退瓦剌进攻,稳定国防局势。英宗复辟,稍改正统年间年少昏庸之气,敬天勤政,国家机器运转基本正常。宪宗在位期间,无所作为,任用佞臣、宦官,朝中善类被驱斥殆尽,朝政日趋黑暗腐朽,国家财政危机日趋严重,社会矛盾尖锐激化。不仅蒙古瓦剌、鞑靼经常入犯,而且农民抗争、流民暴动不断。

弘治年间,孝宗勤于政事,任用贤能,注意节俭,屡禁宗室、勋戚侵占民田,因此获得“弘治中兴”的美誉。武宗好声色逸乐,迷恋藏传佛教,荒嬉腐朽,朝政又趋黑暗败乱。世宗改革武宗弊政,并清理庄田,多所兴革,“天下翕然称治”。寻兴起大礼议,致使群臣纷争不已。世宗极度崇尚道教,迷信方术,政事则委于权臣严嵩等。这一时期,鞑靼骚扰于西北,倭寇进犯于东南,农民起义不断发生,“府藏告匮”,加派随之而起,明朝“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,因以渐替”^①。

这一时期,明朝政治日趋黑暗腐朽,财政危机日甚,封建经济走向瓦解,“南倭北虏”猖獗,藩王叛乱,民众起义蜂起。王守仁创立心学,风靡学林。民间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,白银日趋货币化,商品经济逐渐繁荣,一批工商业市镇崛起,私人海外贸易兴盛,社会风气经历由俭入奢转变。

(3) 明朝后期,从隆庆元年(1567)至崇祯十七年(1644),是明朝改革、衰亡时期。

穆宗革嘉靖朝弊政,限勋戚庄田,实现俺答封贡,减赋息民,边陲宁谧。然辅臣相轧,结党相攻,种下明代后期朋党相争之根。万

^① 《明史》卷 18《世宗本纪赞》。

历初年,张居正辅政,整饬吏治,摧抑豪强,清丈土地,推行“一条鞭法”,“国势几于富强”。张居正卒后,神宗亲政,因国本之争等,逐渐怠于政务。神宗大事营建,挥霍浪费,加上万历三大征,国库空虚。他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掠夺民财,多次激起民众反抗。万历后期,群臣党争,“门户角立”,社会矛盾日趋激烈。史称,“明之亡,实亡于神宗”^①。

光宗在位仅一个月。天启年间,后金(清)崛起于辽东,并屡败明军;陕西爆发流民起义,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。熹宗昏庸懦弱,信用宦官魏忠贤,屡兴大狱,迫害正直的东林党人,政治极其黑暗腐朽。清仁宗谓:“明之亡,不亡于崇祯之失德,而亡于神宗之怠惰,天启之愚駄”^②。思宗继位后,清除阉党,起用东林党人。但他多疑刚愎,屡易辅臣,朝臣党争复起;中清朝反间计,杀蓟辽督师袁崇焕,使辽事更不可为。内地农民起义蜂起,明朝渐难支撑。国家财政日绌,加派三饷,更激化了社会矛盾。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,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,思宗自杀,明朝灭亡。

这一时期,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繁荣,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,海外贸易迅速增长。社会风气丕变,社会上普遍出现重商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,逾礼越制现象屡见不鲜。哲学、文学等领域,追求个性自由解放,否定程朱理学,反对封建专制,形成为潮流。传教士东来,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,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欧洲科技文化。这一切都预示着,明朝后期的中国正处于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。

总之,明朝“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、保守与开放并存,表现出明显的转型趋向的时代。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,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

^① 《明史》卷 21《神宗本纪赞》。

^② 《清仁宗实录》卷 127,嘉庆九年三月壬寅。

宣告转型的失败”^①。

二、明朝宗教特点

传播流衍于二百七十六年历史中的明朝宗教，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第一，最高统治者采取既提倡和保护，又整顿和限制的宗教政策，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。

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、影响深广的社会现象。它的特点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，存在着超自然、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或实体（“神”），主宰自然和社会进程，决定人世命运和祸福，从而使人对其产生敬畏和崇拜的思想感情，并由此引申出相关的信仰认知和礼仪活动。根据宗教社会功能学派的说法，宗教“用神或神的诫命作为人们崇拜敬畏的象征性对象”，发挥“维系社会的稳定和一体性”的作用^②。

中国宗教起源很早。历代统治者多数崇信宗教，并提倡和保护宗教，神道设教，发挥和利用宗教维护统治的功能，同时历代统治者也对宗教加以整顿和限制，甚至严禁，以抑制宗教势力的发展和膨胀，防止宗教危害其统治。历代以来，最高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主要就是这两方面，不过不同时期、不同帝王的宗教政策着力点不尽相同，因此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代王朝兴衰治乱，留下不少经验教训。明朝统治者吸取和借鉴历代兴衰经验和教训，也对宗教采取既提倡和保护，又整顿和限制的政策，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。

明朝的宗教，以佛教和道教为主，势力和影响最大，是明朝宗

^① 郭培贵：《明代的历史特点及其经验教训》，载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6期。

^② 吕大吉：《宗教学通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57页。

教的主体。明朝初期，诸帝大多勤勉有为，虽崇信佛教、道教，但着意整顿和限制，制定和完善了既提倡和保护，又整顿和限制的政策，诸帝基本上在整顿和限制政策框架内对佛教、道教加以保护和提倡。明朝中期，最高统治者多平庸怠惰，他们崇奉佛教、道教，尤其是藏传佛教。其中，宪宗佛、道兼崇，武宗迷恋藏传佛教，世宗极度崇拜道教。明朝初期制定的对佛教、道教整顿和限制的政策，在明朝中期常常得不到很好的执行，客观上对佛教、道教起到很大的提倡和保护作用。明朝后期，最高统治者怠政昏庸，崇信佛教、道教，但除神宗、李太后外，多无过度之举，而思宗甚至排斥佛教、道教。可以说，尽管明代各朝多不同程度地提倡和保护佛教、道教，却又始终保持着对它们的整顿和限制，控制出家人数、抑制寺观经济的方针一直没有改变，“即使暂时有所放松，但很快（或在本朝，或在后朝）即有所纠改”^①。

对于伊斯兰教，明朝统治者优容与约束并用，实际上实行的还是既提倡和保护，又整顿和限制的政策。不过，伊斯兰教在明代传播的区域、范围有限，势力和影响也不大，加上明朝最高统治者并非穆斯林，所以对伊斯兰教无论是优容还是约束都着力不多。天主教于万历年间传来，因其作为外来新宗教，统治者限制为多，而尤以南京教案为甚。崇祯年间，思宗对天主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好感，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，但提倡和保护作用有限。对于民间秘密宗教，从明初开始，最高统治者即制定严禁和镇压政策，限制其势力发展。尽管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暂时可能对个别民间秘密宗教认识不清，有所提倡和保护，但整体上国家还是执行严禁和镇压政策。

可见，明朝统治者从维护王朝统治的角度和宗旨出发，神道设教，对各种宗教实行既提倡和保护又整顿和限制的政策，而以整顿和限制为主。应当说，明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基本是成功的，它使

^① 抽文：《明代佛教政策述论》，载《文史》2004年第3辑。